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與機遇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準¹後，由於未能適時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隨後增長動力減退，最終出現經濟停滯不前的狀況。有研究指出，在上世紀 60 年代，全球有 101 個中等收入國家；到 2011 年，這些國家中僅有 13 個發展成為高等收入國家。例如，早在 19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就與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地區一起踏上了中等收入的台階；但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仍無法像「亞洲四小龍」那樣，成功晉身發達國家的行列（見附件圖 1）。究其原因，宏觀經濟不穩、債務危機頻發、貧富分化、社會動盪等多種因素導致了這些拉美國家中途折翼，成為經濟學教科書中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教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2013 年 4 月發佈的《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中，從經濟體制、人口特徵、基礎設施、貿易結構及宏觀經濟環境五大範疇評估了亞洲部分中等收入國家的表現，並據此嘗試對其未來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進行初步判定。報告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風險主要源自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後以及投資率過高，由此埋下了不可持續發展的隱患；但另一方面，人口撫養比仍然較低、基礎設施建設穩健以及貿易結構趨於優化，這些因素則是內地的優勢所在（見附件圖 2）。

加緊體制改革 減經濟下行風險

根據 IMF 的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包括法制水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以及監管效率等，均會影響當地的經濟前景。具體而言，良好的法制環境和完善的產權保障會減小經濟放緩的概率；而政府如果對經濟活動較少干預，並且能夠有效地放鬆對信貸市場、勞工市場和商業活動的監管，則有利於經濟健康發展。加拿大費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佈的《2012 年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顯示，中國在政府規模、法制結構、產權保護及市場管制方面的評分較低。可見，體制問題仍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

另一方面，近年中國的投資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了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 2008 年因應金融海嘯而推出 4 萬億刺激經濟的措施之後，更攀升至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五成左右。大手筆的固定資產投資雖然在「穩增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亦衍生重複建設、產能過剩、資產泡沫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加上政府投資比重上升容易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導致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而這種粗放型的經濟發展策略近期已漸漸走到了窮途末路。

中國領導人對上述兩大經濟風險已有較深刻的認識，並加緊採取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國務院更於今年 5 月發佈了《關於 2013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其中，簡政放權的改革思路或會促使政府著手建立「有形之手」與市場機制之間合理平衡，更科學地釐訂二者的邊界，並透過減少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干預來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以培育、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中央亦提出將

¹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中等收入國家是指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介於 1,026 至 12,475 美元的國家；在亞洲，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中國、印度和越南等新興經濟體。

會深化政府的機構改革和創新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這些新的施政方向有助於轉變政府的職能，但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和摸索，才能逐步完善和規範化。

近期中央亦釋放出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市場准入的明確訊息，除了推動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能源、鐵路、電信等領域之外，亦為社會資本參與鐵路投資打開綠燈。有關改革旨在調動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市場力量，一方面可以引入競爭機制，打破根深柢固的行業壟斷；另一方面亦有助於改善當前投資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狀，進而紓緩產能過剩的潛在風險。在某種意義上，中央不再依靠行政手段來「指點江山」，而是借助市場經濟的力量治理產能過剩，顯露了其管治思維正在發生「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 的端倪。

再造人口紅利 鞏固既有優勢

IMF 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人口撫養比 (Dependency Ratio) 與其經濟增速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人口撫養率上升往往會增加經濟放緩的概率。與亞洲其他中等收入的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勞動人口無論是在總量抑或是相對比重上均有一定的優勢；目前中國的人口撫養比仍處於 38% 左右的較低水平 (見附件圖 3)。可見，「人口紅利」不但是促成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里高歌猛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還是一道減低中國墮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安全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勞動力供應格局近期正呈現微妙的變化。2012 年中國的勞動人數較上年減少 345 萬人，是近 30 多年來首次出現下跌；而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亦由 2011 年的 69.8% 下降為 69.2%，為連續第二年下滑。隨著勞動人口縮減的現象有可能變成為「常態」，加之人口老齡化現象日趨嚴重，預料中國未來的人口扶養比將會攀升，令「人口紅利」的優勢逐漸弱化。

計劃生育政策是內地勞動人口增長後繼無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加上生育觀念的改變，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 1995 年的 1.99 降為 2010 年 1.18，遠低於維持人口正常更替所需的 2.1 水平。雖然近期內地正醞釀鬆綁「一孩政策」，但這項行之已久的國策難以在短期內改弦更張；即使放寬政策，亦需經過頗長時間才可能對勞動力結構有所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對勞動人口數量下降的主要策略選項應是以「質」的提升代替「量」的增長，透過加強教育和在職培訓來提高勞工的生產力，再配合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創造智慧型的「人口紅利」。近年中國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雖有長足的進步，但整體的水平仍然偏低。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為 3,700 美元，遠低於韓國和新加坡的 27,800 美元和 51,200 美元；顯示了未來可提升的空間十分巨大。

地方債務攀升 基建發展藏憂

基礎設施的滯後是制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因素。IMF 認為，就交通、能源及通訊等基礎設施水平而言，印度、泰國和菲律賓等相對落後，是影響經濟的較大隱憂；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投資於各項基礎設施，基建水平在亞洲中等收入國家中處於領先位置，亦為經濟增長奠定堅實的根基。

必須警惕的是，在近年中國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的同時，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亦逐漸浮出水面。不少地方政府將投資基建項目作為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甚至作為政績工程的指標；其結果是政府主導了大量基建項目的投資運作，相應亦承擔巨大的融資壓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地方政府的舉債規模更是迅速膨脹，融資平台數量急劇增加；根據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官方統計，中國目前的地方債務總額可能介於 15 萬至 18 萬億元人民幣。

地方政府在進行投資基建項目的決策時，往往並非完全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而且不少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亦不足以產生覆蓋資金成本的回報率。另一方

面，除預算內的稅收收入之外，土地出讓金已成為近年許多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主要財源；但在中央堅決調控樓市和推動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亦開始無以為繼。如果上述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風險反過來或會構成阻滯未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近期中國財政部為新疆、安徽等四個地方省區代理發行了涉及 422 億元人民幣的地方債券，表明中央認為當前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仍處於可控範圍；但要真正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儘快改革中央與地方的財稅權分配關係以及建立地方政府自主發行債券的機制至關重要。配合日後城鎮化所衍生的巨大基建投資需求，地方政府亦須借助民營資本的力量，逐步將經營性資產向市場開放；這方面的改革最近已初現曙光。

產業升級加速 貿易結構優化

從貿易結構的角度看，有利的經濟地理位置可以增加一個國家開展對外貿易和吸收外來投資的機會；而其出口的產品實現多樣化，以及所在的區域是否有蓬勃的內部貿易(Intra-regional Trade)，均會影響該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近年亞洲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性日漸上升，加上中國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加快，均可推動中國的貿易結構進一步得以優化。

亞洲開發銀行的《亞洲 2050：實現亞洲世紀》預計，亞洲經濟總量於 2030 年將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 35%，到 2050 年或將佔到 51%，較目前 27% 幾乎翻一番；隨著國際經濟的重心向亞洲轉移，中國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將會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近年亞洲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更形密切，內部貿易所佔的比重已由 1998 年的 45% 上升至 2011 年的 55%。中國亦銳意參與區域性經貿合作，先後與香港、巴基斯坦、東盟、台灣等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並啟動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以及與東盟、印度、日本、韓國等 16 個國家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議(RCEP)展開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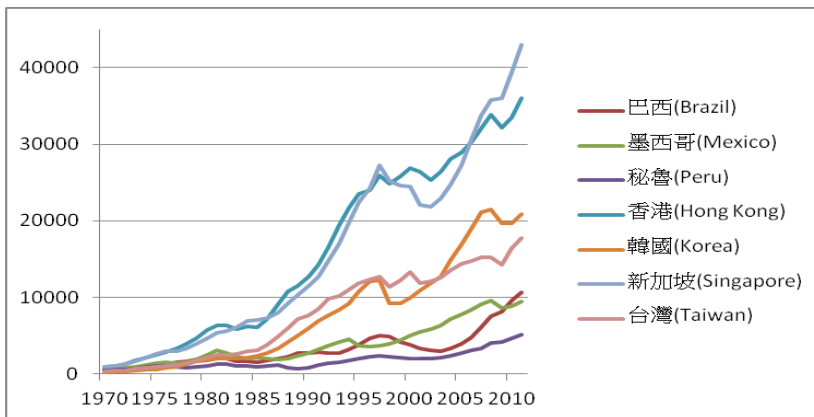
金融海嘯之後，世界經貿格局呈現一種「西方不亮東方亮」的態勢。相應地，中國對歐美兩大傳統市場的依賴程度趨於下降，而對亞洲經濟體的貿易額則錄得較快增長。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間，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額平均按年增長 9.7% 和 5.2%，遠低於同期對香港和東盟國家出口的 15.6% 和 16.5% 增幅。內地整體的出口市場結構正逐步「東移」，亦更趨分散化。

與此同時，勞動成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快速上漲亦促使中國的製造型企業加緊產業升級和轉型，透過改進技術、提升產品檔次和創建自主品牌等策略，朝高品質和高增值的方向轉變，進一步帶動了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以 2012 年為例，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突破 6,000 億美元，增長率達 9.6%，高於紡織、服裝等七大傳統勞動密集型商品的 8.6% 出口增速；佔總體出口的比重從 2011 年的 28.9% 上升到 29.3%。

概括而言，在經歷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中國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國家；而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道難關，是中國緊接著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中國面臨更加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充滿著機遇和挑戰。新一代領導人能否「以史為鑑」，透過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帶領中國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令人翹首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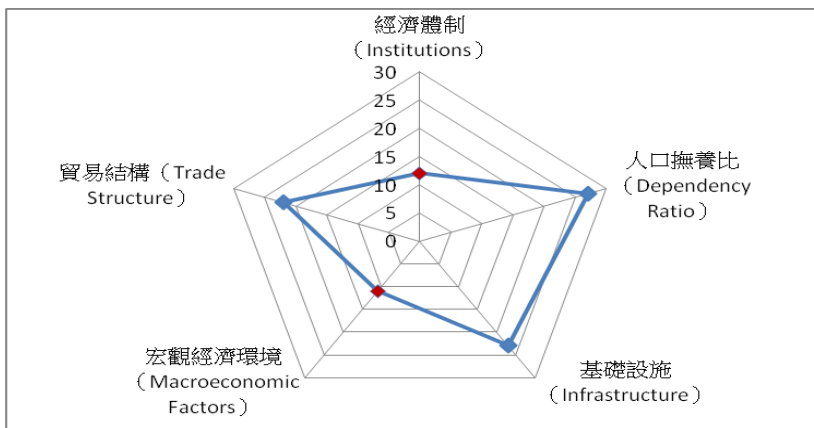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附圖1: 「亞洲四小龍」與拉美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比較 (單位: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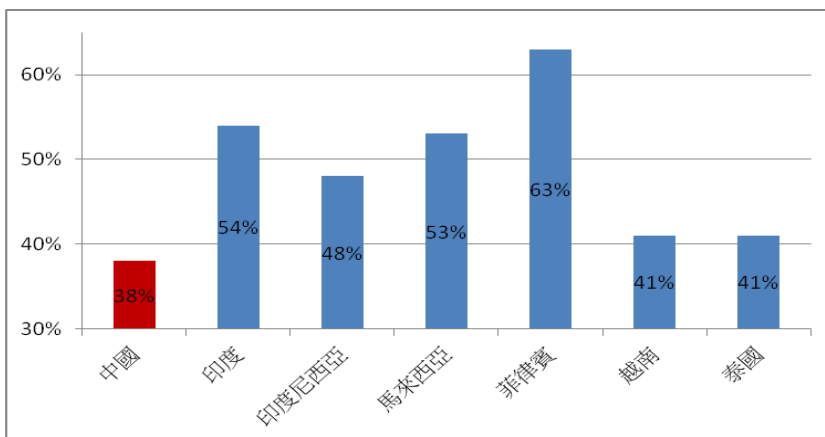
註: 數據來源: 世界銀行數據庫

附圖2: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比較



- 註: 1. 分數越高表示相關領域的當前表現越好
 2. 數據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3 年 4 月《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

附圖 3: 亞洲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口撫養比之比較



- 註: 1. 人口撫養比 (Dependence Ratio) 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 (未滿 15 歲和 60 歲及以上) 人數與勞動年齡 (15 至 59 歲) 人數的百分比
 2. 數據來源: 亞洲開發銀行數據庫